

乌丙安：站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前沿

本报记者 李海峰 王林

他是中国最早倡导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民俗学家之一；他是最早参加国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中国学者；他在联合国官员、专家面前的一席简短演讲，为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有的权利作了有效的呼吁和维护；他曾数次上书中央，提出轰动全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建议；他的名字叫——乌丙安。

来到乌丙安教授的家中时，他刚刚从黑龙江开会回来，看上去心情不错。他说这次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很有成果，我国向世界公布了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一个伟大的壮举！乌丙安告诉记者，联合国遗产委员会历来都坚持，任何国家只能两年申报一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对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来讲是极不公平的。经过近几年的积极努力，我国赢得了可以将备选世界遗产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先公诸于世的权利，有了向世界展示那些宝贵遗产的平台。乌丙安越说越激动，我们的聊天也就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题开始了。

“陈芝麻烂谷子”中的文化价值

作为长期从事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工作的学者，乌丙安对于目前我国的民间文化遗产状况，有忧虑，也有欣喜：“我国民间文化遗产的家底在近现代的历史发展中遭到过劫难。‘文革’十年，把代代相传的优秀民间艺人、匠人的技艺传承给斩断了。保留下来的优秀艺人，我估计连一半也不到。比如东北大鼓大师级的人物霍树棠，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的徒弟、亲人都受到了牵连，目前只有他的孙子霍大顺和极个别的艺人继承了东北大鼓艺术，他们如今也只会唱很少几个段子，还都是新段子。即使这样，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他们不明白，这些东西曾是全东北民间最喜爱的先进文化艺术品种，是农耕文明历史上的先进文化，他们轻视民族、民间的艺术创造，认为当今历史就是要淘汰这些东西，这显然是很错误的。我一直认为大量民族的民间的优秀文化艺术是很重要的文化，因为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的文脉，是亿万民众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决不应该把它斩断！”

让乌丙安感到欣慰的是，我国政府和民众上下一体已经开始重视起保护民间文化遗产这件事，并且有了喜人的成效。2005年6月，我国作为第六个签约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6年6月，在中国遗产日到来之前，我国终于将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向世界公布。但是，乌丙安认为，从总量上看，目前的阶段性成果还只是初步的，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地位还很不相称。

5分钟闭幕词赢得7次掌声

上个世纪80年代，乌丙安先后7次去日本讲学。在日本，政府和民间对无形文化财产的全面成功的保护让乌丙安特别感慨。他发现日本人的普遍心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根基、文化认同和文化主权，是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回国后，乌丙安开始为保护我们自己的民间文化而努力。他参与了编撰《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工作，一做就是10年。那时，他又去韩国、德国和匈牙利等国家多次讲学访问，这些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深深地触动了她。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以民间团体为主体，乌丙安和几位同仁带头发起了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倡议。2002年，乌丙安和冯骥才等带动国内百余专家发起了抢救民间文化的行动，他们遍访全国各地的古镇、古村落，考察民间木版年画、民间剪纸的老根据地，为保护民间文化在

北京举行会议大声疾呼。他们的努力渐渐得到了积极的回应。2002年底，一次由国家文化部组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有联合国官员和国际、国内顶级专家参加的，关于人类和非物质遗产的大型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乌丙安被邀请在大会上宣读论文，并以与会代表中年龄最长的学者身份被推举在那次会议上致闭幕词。

在此之前，联合国遗产委员会一直坚持的规则是：“文化大国小国一律平等，两年只能申报一个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乌丙安为此在闭幕词中为弘扬中国文化遗产向联合国官员鸣不平：他强调，“在国际政治上，国家大小一律平等，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文化上，大小国家的发展从来就是十分不平衡的，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异常丰富，申报额度应该以优秀文化遗产项目本身的质量和数量为依据裁定。现行规定是一个歧视文化大国的不公平的规定，应该修改。否则的话，中国最优秀的世界级遗产恐怕几百年以后也申报不完。这显然是很不合理的。”在这次大会上，乌丙安讲话底气十足，充满激情，5分钟的发言竟赢得7次掌声。

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国国家文化部首次聘任包括乌丙安在内的两位专家共同参与指导，正式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两年后，联合国的规定终于有了放宽：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可以将备选世界遗产名录的国家遗产名录先公布于世。这样，中外类型相近的申报项目就有了比较和相应的参照，得到国际认同。

“申报端午节世界遗产”内幕

谈起2004年沸沸扬扬的“申报端午节世界遗产”事件，乌丙安缓缓讲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年4月初，他参与了在北京举行的对包括端午节节日民俗在内的民间文化保护项目进行筛选的工作，但最终确定的39个保护项目中却没有端午节。就在此时，乌丙安接到韩国江陵市市长发来的邀请书，邀请他参加江陵市庆祝端午节的典礼，并由韩国著名教授电话敦请他一定要来，因为韩国要将端午节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撂下电话，乌丙安的心绪久久无法平静，他连夜给文化部两位部长各写去了一封特快专递信。在信中，乌丙安紧急建议关注友邻国家申报端午节世界遗产的举动，同时赶快启动我国端午节节日民俗的保护项目，因为中国有29个民族12亿5千万人在过端午节。

不久，《光明日报》在学术版一个不显眼的位置登载了乌丙安这封信的详细论证和说明，但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第二天，《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乌丙安紧急呼吁的文化信息，结果引起轰动效应。乌丙安在一天之内接到了300多个电话！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网站蜂拥而至，将乌丙安推向“申报端午”事件的风口浪尖。

然而，在喧嚣背后，人们并不清楚乌丙安内心的真实想法。乌教授说：“我写信的本意是呼吁有关部门重视民间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因种种原因并没被当回事。不过有些报道就变了，什么‘抢注端午’、‘捍卫端午节’……这是对联合国一些章程规定的不了解。要知道，‘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由于几千年的世界性流传，具有了‘文化共享性’，和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的独有性是有区别的。他国申报了，我们还可申报，即使联合国批准了，我们也可以再申报，只是谁先报和谁后报的差别。”

乌丙安说，韩国江陵市的“端午祭”在1967年就被批准为国家级第13号“重要无形文化遗产”而予以保护。在韩国过的那个端午节让乌丙安印象深刻，原汁原味的典礼仪式和炫目的传统歌舞，无不显示着韩国人对端午节的历史尊重和人文理解。2005年11月，韩国的“江陵端午祭”正式被批准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5月，我国终于正式批准湖南汨罗端午节、湖北秭归端午节和江苏苏州端午节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予以保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难在哪

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奔走呼吁了这么多年，乌丙安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很干脆：缺钱。乌丙安说：“现在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国家财政每年投入2000万元，这实在太少了，简直是杯水车薪。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

任。否则，保护遗产就只是一句漂亮的空话。我现在心里特别难受，现在有的整村整村的文化遗产都在出卖啊！被人买走的都是一些瑰宝，买了就用集装箱运到国外了。中国没有民俗博物馆，说不定有一天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就可能是在某个发达国家召开了。这让人警觉啊！文化安全、文化主权不容忽视，当务之急是应就此尽快立法。”

除了钱，乌丙安觉得人才是另一个困难。他认为，必须采用快餐的办法对人才进行培训。保护是持久的，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十年、二十年，要一直保护到与人类共存亡。他还认为，保护民间文化，必须优先保护老艺人和他们的技艺传承，帮助老艺人把技艺真正地传下来。各级政府要在传承人保障方面考虑得更多、更实际，比如给他们提供和创造一些必要条件，让他们带徒弟。传承人最大的特点是传承，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如果不抓紧保护和抢救，再过 20 年，就会有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化为乌有，就会出现“人亡歌息、人亡艺绝”的千古遗憾。